

陈红云 著

生於六十年代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于 60 年代/陈红云等编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10

ISBN 7 - 220 - 06083 - 1

I. 生 ... II. 陈 ... III. 人物—专访—报道
IV. G634.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8324 号

SHENGYU LIUSHI NIANDAI

生于 60 年代 (1)

陈红云 著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袁久勇 王 苗
周园苑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679239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所 (028 - 5910167)

开 本

730mm × 988mm 1/16

印 张

32.75

字 数

490 千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3000 册

书 号

ISBN 7 - 220 - 06083 - 1/F·666

定 价

56.00 元 (共两册, 每册 28.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向“六十年代势力”致敬

美国NBC记者汤姆·布罗考在他的《最伟大的一代》中将那些在1920年繁荣期出生,在少年时代经历大萧条,在青年时代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美国人称为“最伟大的一代人”。这些人经历过阳光灿烂的童年,感受过繁华和灾难,承担过压力和责任。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较之其他年代的美国人对于责任、理想、勇气、尊严有着更彻骨的认识。

在中国,责任、理想、英雄、革命……这些词及其他所代表的精神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另类。如果说在50年代生人之后,谁还在滚石上山,传承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血脉的话,那就是60年代生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硕果仅存的麦田守望者。不仅如此,他们也正成为中国的脊梁,背负着中兴民族的重任。

不少人感兴趣地问,为什么《赢周刊》这样一份以服务中小企业为使命的报纸会推出《生于六十年代》专栏,长期、系统地关注这一群体的心路历程?

我想,首先是对人性的关怀使我们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赢周刊》迥异于同行,标志之一无疑是我们服务中小企业的独特定位;标志之二则是因为《赢周刊》始终不渝的、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没有任何一份财经报纸像《赢周刊》这样对经济活动中人给予如此浓墨重彩的渲染。而60年代生人已然成为中国经济的扛鼎势力,对60年代生人的系统、深入的逼视,可以使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感悟到中国经济的鲜活和感性。

《赢周刊》是一张年轻的报纸,《赢周刊》团队是一个年轻的团队。我们抱着做成一件事的理想走到一起。我们面临的是竞争白热化的环境和资源占有不足的窘迫。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赢周刊》之所以能顽强地挣扎出一片自己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理想主义所赐。“用理想激励自己并感染别人”是引领《赢周刊》走出物质和精神沼泽的旗帜。是60年代的气质给了我们这个团队特殊的精神慰藉。

一个民族,永远需要鲁迅所谓的“脊梁”,需要这个“脊梁”的担当和其所体现的精神感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60年代生人及其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属于整个时代和社会。

谨以“生于六十年代”丛书,向“六十年代势力”致敬!

赢周刊总编辑 熊晓杰

2002年10月

飞过

陈红云

2001年11月19日划过中国上空的那场流星雨，将永远铭刻在我的生命里。

北方凛冽的夜空下，年轻的学子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空旷地，如同某种集体仪式，在静静地等待着奇迹的发生——真的恍如昨天，十八年前等待新年焰火的时刻忽地重现，只是那时候未来有着无数的可能，而此刻，每一天的工作日程已经是满满的答案。

《生于六十年代》采访首批在京的选定对象，小住于中央财经大学，于是有了这场与青春和星群的邂逅，而地球等待这次灿烂的邂逅，也足有33年。

从踏着初雪采访王志东开始，14天时间里，我和同事采访了11人，这种经历如同漫长的寻找，我们倾听、交锋、发现、分享——呼吸着60年代的空气，感觉甚至有点不真实。唯一清晰记取的是，他们如日中天的成功和把个体智慧转化成集体行动的出色努力。

我为同时代的优秀分子而深深动容。

等待中，世纪罕见的流星雨还是来了，那么美丽绚烂，如同一次集体的辉煌寂灭，在最高峰值持续40分钟的时间里，每一道轨迹都写下了它不可复制的历程——噢，人类的群星，不也同样以无悔的燃烧照亮黑夜么？生于60年





小学五年级。



初中二年级。



病后初愈。



学毕业后2年，和妈妈、妹妹在一起。

代这群人，就这样在我的视线中被压缩，某一天，某一小时，当你与我们的书相遇，这场流星雨，就会再度显现。

最后一颗星已经寂灭。

想起了大学时代翻得起了毛边的《风云人物采访录》。也许因为法拉奇与20世纪历史人物的不朽对话，也许因为谈话中彰显的个性、睿智和不折不挠，我在书的一角写下了一行字：历史应该感谢这份独特的视角。

今天，当青春已经走过了末梢，我终于以自己的视角进入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执着于信念，肩负着道义与效益，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90年代集体发光，他们当之无愧地应该被历史记忆。

星空再次复归宁静——想起了遥远的童年在爷爷膝下看星。

整个大地都仿佛沉沉睡去。那些闷热的夏夜清涼的清晨，远处的山峦近处的流水，都给我的生命以真正的滋养。

多年前，当我躺在病床近乎绝望之际，正是这种割舍不去的滋养和不言放弃的手让我坚持。

时光将伴随着这些名字一同逝去，他们是吴开唐、刘洪胜、卢菁光、翁光宇、饶芑子……我的导师们，请接受我的深深感激。

还有我的母亲父亲。

天空无痕，我已飞过。



大学时代。

目 录

- **崔健：一个和一代** …… 001-010
崔健，著名摇滚音乐人。
- **段永平：本色英雄** …… 011-020
段永平，广东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企业家梦之队成员之一。
- **米丘：寻找灵魂的颂诗** … 021-030
米丘，自由艺术家，长安街标志性作品《飘》的作者，2000年评为中国十大新锐人物。
- **杨澜：千万次地问** …… 031-042
杨澜，阳光文化董事CEO，著名节目主持人。
- **蹇宏：生命第一** …… 043-054
蹇宏，中国内地第一位MDRT美国百万圆桌会议顶尖级会员，曾经大富大贵，继而赤贫如洗。现在充实地经营着平安保险“生命第一”团队。
- **张元：自由之重** …… 055-064
张元，中国电影第六代代表人物，以记录电影著称于世。代表作包括《疯狂英语》、《金星小姐》等。
- **李阳：挑战上帝** …… 065-076
李阳，“疯狂英语”品牌始创者。曾在“中国十大新锐人物”评选中排名第一，被誉为“最具梦想家气质”的青年俊杰。
- **方洪波：我思故我在** … 077-084
方洪波，美的集团副总裁兼美的空调事业部总经理。在他的领导下，美的空调成为全国领先品牌。
- **陈侗：比自由走得更远** … 085-094
陈侗，博尔赫斯书店创始人、画家、出版策划人。代表作有《速写问题》、《自己的世界》等。

- 余明阳：风云吞吐** …… 095~106
余明阳，著名策划人，深圳大学传播系主任。曾应邀担任沱牌曲酒公司总裁。
- 王峻涛：有一种力量叫做梦想**
…………… 107~116
网名“老榕”，著名网络人，以“金州不相信眼泪”的帖子和8848网站而扬名。
- 高小龙：正在做的已经过时**
…………… 117~128
高小龙，著名影视广告人。2008年奥运会申奥片执行导演。
- 窦文涛：独木成林** …… 129~140
窦文涛，“名嘴”，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主持人。
- 张广天：以独立知识分子的名义**
…………… 141~150
张广天，著名自由戏剧家、吟唱诗人。主创作品包括《切·格瓦拉》、《红星美女》等。
- 席殊：书卷乾坤** …… 151~162
席殊，中国书业名人，著名“写字先生”。天卷席殊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 赵达裕：我为波狂** …… 163~174
赵达裕，著名球星，80年代叱咤中国足坛。
- 方力均：自由心灵之路** …… 175~186
方力均，著名先锋画家，“玩世现实主义”风格开创者，画作价值位于中国同类画家之首。
- 张在东：缔造神话** …… 187~198
张在东，北京房地产开发商，“锋尚国际公寓”创造者。
- 默默：说是的一代** …… 199~208
默默，中国当代十大诗人之一，后跻身营销策划行业，上海著名房地产策划人。
- 胡泳：理想化生存** …… 209~220
胡泳，《数字化生存》译者，《网络为王》作者。其译著对中国互联网业的发展具有启蒙性意义，人称“胡数字”。
- 杨平：谦者的道路** …… 221~230
杨平，央视《商界名家》等栏目主持人。曾获中国电视经济节目十佳主持人荣誉。
- 欧宁：边缘状态** …… 231~238
欧宁，诗人，先锋策划设计人。
- 李亦非：美丽蹦极** …… 239~250
李亦非，MTV音乐电视频道中国区总经理。2001年在《财富》杂志选出的25位全球企业新星中名列榜首，并成为《财富》封面人物。
- 回首四十年——60代的成长背景**
…………… 251~258



崔健 一个和一代

崔健作为一代人的精神偶像已经历史地结束了他的使命，他以“一块红布”描绘的时代正在过去，对于生于60年代的人来说，小时候憧憬的“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没有做到，而推动整个中国走向文明、进步与强大，正在一天天做到。



崔健

1961年生于北京朝鲜族家庭……

-
- 1975年** 跟随父亲学习小号。
-
- 1981年** 进入北京歌舞团任小号演奏员。
-
- 1986年** 崔健写出了他的第一首摇滚说唱歌曲《不是我不明白》。
-
- 1986年5月** 在北京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第一次演唱《一无所有》。
-
- 1987年** 崔健离开了北京歌舞团，从此开始了摇滚音乐创作和演唱生涯。
-
- 1988年1月** 他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个人演唱会。
-
- 1989年2月** 创作并完成第一张个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
- 1989年3月** 在北京举办“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引起轰动。
-
- 1991年2月和3月** 崔健出版第二张专辑《解决》。
-
- 1994年8月** 第三张个人专辑《红旗下的蛋》发行。
-
- 1998年** 崔健发行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与从前作品不同的是专辑为前卫数码摇滚，反映了20世纪末中国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在崔健的音乐中，中国的民间乐器和西方乐器融为一体，并融进了朋克、爵士、非洲流行音乐、说唱、摇滚的特点和节奏，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
-
- 1989年之后** 崔健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及欧洲、日本、北美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演唱会，受到广泛欢迎。崔健的音乐和歌曲唱出了在极速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和他们对真实和人性解放的渴望。

正好赶上了我们的时代

——80年代的北岛、顾城以诗来表现那代人的内心世界，而你则选择了音乐的方式。顾城那首“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与你的“一块红布”，几乎同出一辙，这是什么原因？

崔：大家生活在同一时代里，那种共同的感觉，只是借我们的口说出来罢了，我们得以站在时代的前沿，是一种幸运，因为一个艺术家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再合适不过的表达，非常痛快，生命的激情存在于压抑太久的一代人心中，他们需要找到突破口。

——你是说时代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选择了时代？你在表达自己的同时表达了全世界？

崔：我的走运正在于此。我发现在刚刚写歌的时候就代表了很多。这是一种运气。某些人以为当时对我的演出禁令会令我愤懑难当，其实我的内心相当幸福。因为我只失去了暂时的表演权，但作为歌者的生存权却一直保留着。我想我作出了一种原则和标准：说真话，按照内心的想法生活和做音乐。这种做法是到今天都有意义的，我不自觉地反对了另一种标准：靠说谎和包装。为了市场无止境地卖弄自己，千变万化，舞台上服装换了一套又一套……

——你的歌中有许多时代的烙印，包括苦难的感觉，其实你的经历并没有大波大澜，那些底层的情感及愤怒从何而来？

崔：我没有经历过什么大苦大难。相反，经受了大苦难可能就不会成为音乐家，而会去写报告文学。而且真正受了大苦难的人是不屑于与人去谈论苦难的，包括所谓表现底层声音的摇滚乐，也恰恰不是来自苦难的国家。我们处于苦难之时，听到的是《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希望的田野上》等等，我认为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是由于艺术家的敏感及想像，偏要苛求历史的苦难其实是对想像力的重大忽视，所有艺术家都是心灵特别渴望美好东西的人，这种渴望没有边际，痛苦便由此而生，艺术发端于压抑，这是千真万确的。还有一点人们不理解，其实当一个人可以表达痛苦的时候，他的内心也是一种巨大的释放，他是兴奋而且幸福的。

——你作为纪念碑式的那些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一切已



经结束，反对媚俗成为你新的使命？

崔：说“使命”这词过于沉重。我只想作出一种诚实的标准。我想告诉他们，只要你舒舒服服地写作，说实话，就能集结起真实的力量，就有自己的市场，本色就是最好的包装。其实不少电视或各种媒体上看到的歌星影星并不一定是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他们只是无法抗衡这种被选择，被宣传攻势、媒体炒作所选择，他们的消费对象也不一定是他们所希望的。我就从不在这方面耗费精力，一套衣服唱到底，我做音乐仅仅为了做一件简单的、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

——热爱你的音乐的人依然热爱，但如今你的音乐受众已不像当年那么广泛，你怎么看这一点？

崔：非常自然。那个时代我处在焦点和风头上，许多人需要自由创作的声音，我正好赶上了。如今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包括独立创作、包装制作与商业炒作，他们各自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我过去的受众已经成长，他们有工作、家庭和孩子，在面对现实时候，音乐显然已经不是他们的中心，所以我的受众已转向了更年轻的一代，不是指70年代，而是80年代出生者！回想一下，我们的青少年时代也是对音乐最上瘾的，买CD，是精神向往的一部分。60年代不熟悉我了，新一代正在熟悉我。

力量是惟一的形式

——你曾经说过中国文字在营养文化的同时又带来一种巨大的消耗，人们宁愿去相信描绘而不愿意相信音乐直接给他们带来的东西，你是怎样感受到这一点的？

崔：我们家是朝鲜族，小时候我记得，父母一喝酒就跳舞，拿着筷子敲着唱，那种交流真是愉快极了，现在的自发音乐娱乐变成了卡拉OK，身体与音乐的结合给破坏了。而且，人们真的宁愿相信文字，这也造成了一种误读，好像我的成功变成了文字的成功。就说当年的顾城，虽然他的诗句表达了一代人的追求，但他自身的最大问题仍是爱情问题，文字掩藏了真相。而今天，当我只想把音乐简化到节奏的时候，人们仍怀念文字与旋律。文字的过强造成了对其他感官的侵犯。不同种族与文明的人交流方式真不一样，如果

听到一段特别好的音乐，中国人会低着头，神情庄重地说“真棒，真棒”，而非洲朋友却马上会动起来，以身体的节奏和语言来应和。在我觉得，非语言性的交流是最直接和舒服的。

——你的艺术观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艺术？

崔：我的艺术观就是活人不能给尿憋死，力量是惟一的形式。人们说“崔健老了”或“崔健死了”，那是他们的耳朵没有适应新的有力量的形式。我是越来越注重节奏了，年轻的一代喜欢，真正的歌迷是不折不扣地追逐新东西的一群。至于做艺术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艺术人口的范围，用自己的能力使环境美好。我发现，所谓消灭战争，并不像政治家所说的那样：为了世界的真正和平，我们必须最后一次拿起武器。扩大艺术人口，战争的烽烟自会日益消散，和平就会到来。国家机器实际上是人类资源的极大消耗，管理是一种服务，中国足球队在米卢的带领下，不是发挥得更好吗？

——你的歌确实结集着各种力量，给人们带来震撼，那种震撼被不真实地演绎了，今后你的路怎么走？

崔：震撼是意外。要说震撼，也是他们自己震撼了自己。你自己希望震的时候它就有，比如我看凯歌、张元、老谋子的东西，早期听何勇、窦唯包括“子曰”乐队的音乐，我都有很大的震撼。我觉得我的追求一直在“走”，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无所有》、《假行僧》到《红旗下的蛋》，我最后走“飞了”，在天上转一圈之后，我发现要的东西不在这儿，我回来了，艺术家的改变是出于本能的，不是较劲。过去的东西较抽象，所以有很大的覆盖率，我想改变这种浪漫与认同，必然会得罪一批人，同时你还得说服一批人认同你的改变，我过去覆盖过的群体如今恰恰要跟他们宣战，不能让他们觉得不痛不痒，当然会有一小撮铁杆歌迷，他们追随崔健胜于追随市场。

——事实上，如今的形势是以歌者为中心转向了以受众为中心，大众口味开始主宰市场……

崔：谁影响谁还不一定。

——在现场演出和做专辑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崔：完全两样。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真正的音乐在现

英雄的父亲，漂亮的母亲，崔健自幼生活在一个美好的革命家庭。



场，那是最原始的音乐，身体的感觉更重要，做一个纯粹的表演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特别舒服和放松，我从来都被音乐感动，而不会被歌词感动，歌词是什么？是思想的一片羽毛，它太轻了……而我在录音棚里是另一个人，我的歌在不断被修正的过程中变得没有错误也没有激情了。

——人们曾经把你喻为一把刀子，在这样的定位之下你还能按内心指引的方向走吗？

崔：如果过去的歌是一把刀的话，可以说如今拿刀的人换了，而刀子直接插在了某一个地方，有的人看不见。我喜欢做后面的刀子。那种拿刀子吓人的事我是不愿意干了。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如今你的生活已进阶到中产阶级了，生活状态改变了，你内心真实的东西还存在多少？真正的摇滚还存不存在？

崔：摇滚并不是真实的代名词。不少摇滚很商业，甚至歌功德。那种在成功之后马上改变生存方式，卖那些自己曾反对的东西的人不少，人们做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来挣钱的确是一种堕落。拥有中产生活而坚持做摇滚并不难，首先要控制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一种坚持做音乐的方式。我在《自由风格》里特别鼓励一种职业作风，你认定自己是一个做音乐的人，就会形成良好的习惯和作风，事业上大起大落不可怕，你的内心是稳定的。有些人一夜之间成了大明星、大腕之后，生活方式马上膨胀，自己的真趣消失了。其实成功的人面临的挑战更大，他就是再怎样努力也难以满足大众的需求，大众是什么？大众对一个艺术家真的不重要，如果重要，顾城是不会自杀的，身要跟着心走。

——北京目前的乐队如雨后春笋，有《花儿》、《秋天的虫子》、《子曰》等等，他们变成了消费时代的一种时尚，摇滚是不是他们的一种噱头，你认为真正的摇滚是怎样的？

崔：摇滚音乐有三个要素：技术、力量和内容，也就是在学习技术的同时必须保证体能和原创。当然它有自己坚持的东西，比如态度激进，与社会敌对，坚持用乐器现场演奏。现在的新生代有它自己时代的形式，至少他们那种歌我写不出来，当然我还看到了更

多更假的乐队。

——你的歌里包含着不少性与暴力，为什么？

崔：文化中的暴力都是反暴力的。描写它不一定是提倡它。艺术是自由和平的调节器，世界上恐怖分子存在就是艺术人口还不够多，人们都愿意真正使用暴力而不是虚拟暴力，其实暴力情绪人人都有，通过艺术发泄出来，就可以达到平衡。说到性，中国古典文学里不是大量存在吗？为什么就不能用歌的方式表现？实际上我在表现性的时候，还真的没有把女性作为第二性的意思，我觉得，特别是年轻的时候，男人对女人的爱是一种性崇拜，对她浑身散发的气息的崇拜，性，有时候是一种无往而不美的心情。

——现在有一帮踏上征途的人，他们想干掉你，他们反对你已经非常主流，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样理解和对待他们？

崔：中国摇滚圈里有一个很大的病毒：老想干掉谁。这成了媒体炒作的新闻，事实上他们没有健康的幸福观念，一个艺术家不是真正踏上了征途，还要看它是个创造过程还是表演过程。其实你就是你自己，其余全是扯蛋。坚持你自己，就是摇滚。西方为什么总有新东西出来，就是因为有些人真的不在乎别人说他，只是在不停地做，创造才是最大的幸福。越是没有个性和创造力，就越需要找个标签，标新立异，这个人下一步就是随波逐流。

——你的作品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一种人生探索，这种探索从什么时候开始？

崔：要说还是从西方作品开始。我最早接触的西方作品是《牛虻》，《牛虻》被伤害了还仍然坚持，这让我很感动。看普希金的诗也很喜欢，但俄国最让我记忆的诗是《叶甫盖尼亚·奥涅金》。这种格式很影响我，它不用交待每个细节，又把故事讲了出来，非常自由酣畅，而《安娜·卡列尼娜》就看了好几遍都没看下去。

——摇滚时代的人在听音乐时喜欢一种状态：穿着肮脏的大T恤衫，头发蓬乱、思想简单、身体极度放松，是不是这种与泥土和大地特别接近的方式使你爱上摇滚，并成为你坚持采用的音乐形式？

崔：相比起“摇滚”，我更愿意说“当代音乐”这个词，不是反抗，是一种自由创

一个模子出来一对父子。



作之声。我的一个搞摇滚的朋友老是喜欢弘扬，弘扬本身就是反对自由创作的，自由艺术应该没有模式，不受任何束缚，人在一种状态中，自然能碰上一种能代表他们的艺术，我赶上了我们的时代。当代音乐是一种正在发展的东西，一切都在搅拌和混合，就看谁搅拌得好。

说实在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爵士乐，它最初就没有言传，只靠技巧和想像力，爵士不是人们概念中的西装革履、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在漆黑的酒馆里一伙分不清东西南北的人在喝酒，完全是地下的阴暗环境里特别亮的一种音乐，它特别有力量。其实我没有改变，《一块红布》、《时代的晚上》、《无能的力量》就是一种东西，只不过音乐形式变了，人们以为内容也变了。若把《时代的晚上》换成《一无所有》再唱一遍，他们准能接受。大众总是有个毛病，总希望《一无所有》之后再来个《二无所有》、《三无所有》，而我给我的音乐的定性是三个自：自信——别丢掉自己；自然——别勉强自己；自由——解放你自己。那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明白我，他们全喜欢《无能的力量》，给我的留言足以让我震撼。

——这个时代与商业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你在商业上如何运作？盗版对你有什么影响？

崔：健康的情形应该是销售为制作服务，制作为创作服务，所以我选择“普涞”作我的经纪公司。要是这一切调过来，创作按制作要求来做，制作按销售要求来做就坏了，但这确实是一个潮流，所以坚持个性的人才会觉得许多路口都是红灯。但是，最毁艺术的还是盗版，最起码我的版税就丢了1000万。如今我面前的五大敌人是：体制的弊病、盗版、媚俗文化、行业内毒品和江湖气息，我们没有真正保护音乐的土壤。这样的时代，我感到无能，惟一能做的，只是坚持。坚持不妥协，也许是我能够选择的姿态，终生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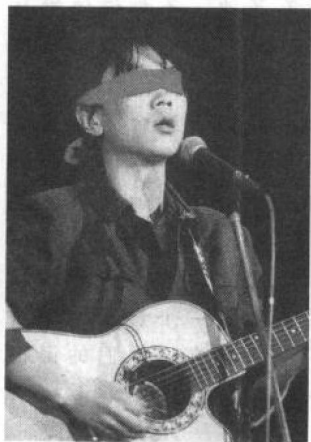
飞了

10年前，当6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正值“愤青”时期，在文化上和思想上进入全面战争状态的时候，一个声音出现了：所有的迷惘、愤怒，裹挟着摇滚的激情奔腾而至，在一代人的内心里排山倒海，涤荡着时代的误判与成长的沧桑。

它就是原创的崔健。

许多同时代的人在回顾以往的时候都发现，崔健是一座绕不过去的

摇滚万岁，歌坛长青——崔健的今日（右）与当年（左）。



009

王铁麻 图

大山。20世纪最后的红色在《一块红布》中定格与淡化。那是一种让人痛心的幸福。一代人想说告别却又止不住怀念，伸手撕去却又根植于心，就像青春期遇到的“花房姑娘”，那么美好地挡着你的道，而你终于要在生命的更大向往中离她而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60代不甘被抛弃，他们跟着内心的声音走，跟着心灵所选定的偶像走，哪怕“从南到北”、“从白到黑”，直到偶像走“飞了”，他们还久久地留连张望。

在雪地里撒过野，在内心最大的一场革命完成之后，涵盖或颠覆整个青春的歌声停止了，一代人开始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他们成熟了。与此同时，偶像的命运开始没落，崔健在一夜之间变老，成为怀旧的象征。

崔健是在时代的端口被选定的对象，人们选定了他，就像选定了自己，这个梦想在破灭的过程中很痛，又很无奈，而他仍然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行。在不少场合，崔健已不唱过去的歌了，他的倾听者转向了更为年轻的80代，他在60代的视线中飞了，却在80代的道路上着陆。

这也许是一场更大的误读。当崔健以音乐说话的时候，人们在寻找他的文字，当崔健的音乐简化到了节奏的时候，人们怀念他的旋律。而崔健不能不走，他甚至走得比以往更快，与其说时代抛弃了他，不如说他抛弃了时代，60年代的人说崔健老了，其实是他们自己集体变老。

2001年的北京国际爵士乐节，我们看到台下的崔健全神贯注，并不仅仅因为爵士是他的最爱，即使是一个最小的乐队在演奏，场内的他都必然会认真地倾听，他让良莠不齐、纷呈杂色的摇滚圈学会了自我尊重。

在一家小酒馆的聚光灯下采访崔健，一场随意或即兴的谈话很快随风而去，真实的崔健像一个影子，而过去影子般的崔健反而更加真实，他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聚光灯下说话的崔健——飞了。